

中国动态拨备制度的实施效果评价

刘 淼 许珍慧*

〔摘 要〕 顺应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趋势,中国于2011年正式引入动态拨备制度。然而,目前该制度实施周期较短,仍处于不断探索与完善阶段,实施效果有待科学评价。本文总结了我国动态拨备制度的整体框架和基本设置,在明确动态拨备制度理念和目标的基础上,运用指标数据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考察了中国动态拨备制度的总体实施效果。结果表明,虽然中国银行业和选取的代表性商业银行基本达到了动态拨备的监管标准,但制度的实施并没有发挥出统计上显著的逆周期特征,而且还存在商业银行利用动态拨备进行资本操纵和利润平滑的现象。对此,本文借鉴国际成功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动态拨备制度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动态拨备制度;效果评价;逆周期性;资本操纵;利润平滑

从会计角度来理解,拨备是会计准则中准确反映企业盈利能力以及当期经营成果的重要工具。但对于银行监管者而言,拨备是防范信用风险的重要工具,与资本的差异在于拨备用于抵御贷款预期风险损失,而资本用于抵补非预期损失。长期以来被广泛应用的传统拨备制度以维护单个金融机构财务健康为目的,带有明显的微观审慎色彩,这也造成了其本身的顺周期性,客观上加剧了金融系统的波动。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深刻暴露了根据“已发生损失模型”计提贷款损失拨备制度的缺陷,各国的会计准则制定者、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市场中的参与主体开始意识到以西班牙拨备制度为代表的、具有逆周期特征的“动态”拨备制度可以弥补其不足,至此,动态拨备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采用。动态拨备制度作为宏观审慎工具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践行宏观审慎监管理念的典型代表。其核心是在进行拨备计提时保证具有充足的前瞻性及逆经济周期特征,从而作为一种“以丰补歉”的机制弱化拨备和信贷行为的周期性特征(李怀珍,2012)。相对于传统拨备制度,动态拨备制度是站在一个完整周期的角度分散拨备计提,在保证金融企业持有足够准备金的同时,以求起到弱化传统拨备顺周期性的作用,在周期内具有相对恒定和平稳的特点。

众所周知,商业银行一直在中国金融业居于主导地位,这种金融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监管部门对拨备制度高度重视。实施动态拨备制度之前,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计提贷款准备时需要综合考虑新企业会计准则、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管理规定以及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在这三方面的政策规定中,按照会计准则计提的贷款拨备具有顺周期性特征;银监会2002年颁布的《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和财政部2005年发布的《金融企业呆账准备计提管理办法》两者总体是要求商业银行依据贷款五级

* 刘淼,经济学博士,吉林财经大学副教授,130117;许珍慧,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部,130500。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BGJ039)的阶段成果。

分类标准计提贷款损失拨备,同样也具有顺周期性;只有拨备覆盖率指标是监管部门根据经济变化形势进行调整的,显现出一定的逆周期特征。但是该指标主要依据的是不良贷款率,未将正常贷款风险考虑在内,而且没有明确的模型来确定这一指标的准确性,不能保证这一指标能够完全地消除拨备计提的顺周期性。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顺应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和理念,自2008年便开始探索动态拨备的适用性和可行性,随后在2010年加快了动态拨备制度的建设步伐,并在2011年通过颁布《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正式建立了动态拨备制度。然而,中国动态拨备制度仍处于初步建设阶段,实施周期较短,实施效果还有待于科学评价。

国外对动态拨备制度的相关研究开展较早,由于数据积累相对丰富,因此评价制度实施效果的文献也较多。例如,Jiménez和Saurina(2006)以西班牙二次修订版本的动态拨备制度为研究对象,采用广义矩估计法分析了信贷过度增长与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并据此评价西班牙动态拨备制度在其中的作用,研究表明西班牙动态拨备制度能够抑制信贷过快增长,有助于银行业稳定。Fernández和García-Herrero(2009)在总结西班牙动态拨备制度实施经验的基础上,利用已有数据对西班牙信贷周期变动情况在动态拨备制度实施前后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西班牙在引入动态拨备制度后,拨备体系的顺周期性明显降低。Balla和McKenna(2009)分析了动态拨备制度的引入对经济危机期间美国银行业的意义,研究表明美国动态拨备制度发挥了减轻银行业周期波动程度的积极作用。

中国对动态拨备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解动态拨备制度、总结国外实践经验、探讨引入动态拨备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动态拨备制度相关指标设定的合理性方面。例如,银监会财会部动态拨备课题组等(2010)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西班牙动态拨备模型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如何在中国银行业实施动态拨备模型进行了制度设计。徐明东和肖宏(2010)基于预期损失模型分析了动态贷款损失拨备规则的作用机制,并总结了西班牙实施动态拨备规则的模式和实施效果。研究认为可以适时改革和推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银行业前瞻性拨备制度。李怀珍(2012)全面阐释了动态拨备制度对于银行监管的积极意义,并介绍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动态拨备制度体系及其设置,最后简要说明了制度实施的良好效果。黄锐等(2014)利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理论上讨论了前瞻性拨备规则及后顾性拨备规则和经济波动之间的相互作用。段丙蕾和陈冠霖(2016)从经济“新常态”对动态拨备制度的影响入手,通过指标数据进一步分析了动态拨备制度的实施现状,发现存在拨备覆盖率监管标准较大、贷款拨备率尚未达标等一系列问题,并提出完善监管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等相关建议。

综合已有文献可知,国内学者对于动态拨备制度较早的研究侧重于讨论国际成功经验的吸收和借鉴,随后的研究则侧重于讨论中国引入动态拨备制度的可行性及面临的问题,鲜见对于制度本身整体实施效果的评价,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拓展的空间。基于此,本文归纳了中国动态拨备制度的框架和设置,进行了相应的国际比较,在明确动态拨备制度目标的基础上,运用指标数据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对动态拨备制度在中国的应用效果进行考察,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动态拨备制度的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建立、工具选择和实施细则等问题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一、中国动态拨备制度的基本框架、国际比较及其监管指标分析

(一) 拨备的基本标准与设置

《管理办法》明确规定,银行业监管机构设置贷款拨备率和拨备覆盖率指标考核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的充足性^①。贷款拨备率基本标准为2.5%,拨备覆盖率基本标准为150%。两项标准中较高者

^①拨备覆盖率=贷款损失准备/不良贷款余额;贷款拨备率=拨备覆盖率*不良贷款率

为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的监管标准^①。贷款拨备率设定为2.5%，主要考虑了以下三个因素：一是中国银行贷款历史损失率。国际经验表明，跨周期的历史损失数据可以作为判定贷款未来预期损失的基础。运用中国资产管理公司2008年以前不良贷款现金回收数据对贷款损失率的测算表明，中国商业银行贷款历史损失率约为3%，确定拨备率为2.5%的监管指标有充足的经验数据支持；二是中国银行业未来风险状况。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信贷投放呈现了爆发式增长，与此同时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等贷款的潜在风险不断积累。此外，影响贷款质量的不利因素在增加，如经济发展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因素都将影响到贷款质量的变化；三是中国银行业现实财务承受能力。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银行业在国际上一枝独秀，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资本充足率也处在较高的水平，国际竞争力明显提升，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支撑贷款拨备率的进一步提高。

中国动态拨备制度实行贷款拨备率和拨备覆盖率相结合，主要原因是：拨备率强调所有拨备计提的共性，是根据贷款历史平均损失率确定拨备计提要求，对正常贷款拨备计提作用更大，也是新拨备监管制度“前瞻性”的重要表现。而拨备覆盖率更加强调对不良贷款损失的弥补，因对不良贷款拨备计提的作用更大。当商业银行不良率较高时，拨备覆盖率将最终决定拨备的计提水平。因而，拨备覆盖率与拨备率相结合互为补充，能够有效克服实践中拨备覆盖率奇高，而贷款拨备率相对不足的现象，对于贷款不良不同水平商业银行的拨备计提均起到了有效的约束作用。

（二）拨备的“动态”调整机理

根据《管理办法》规定，拨备指标的监管标准并不固定，也不是一直维持在某一比例水平上，而是监管部门可根据商业银行的整体经营状况以及单个商业银行贷款结构的不同进行灵活调整，从而体现出了动态拨备制度的“动态性”特征。具体来说，监管标准的“动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经济周期的发展阶段为依据对拨备监管指标进行动态调整。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实施不同的监管指标比例。例如，在经济繁荣时可适度提高监管标准，多积累动态拨备。在经济衰退时适当调低监管标准，释放经济上行期积累的动态拨备，以提高拨备计提的顺周期特征，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判断经济周期的变化，判断经济周期所需要的因素包括：经济周期、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商业银行整体贷款分类偏离度、贷款损失变化趋势等，二是对单家金融机构的拨备监管指标差异化监管。例如根据单家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状况体现不同严格程度的监管。信用风险小的银行可适当降低监管标准，反之则提高拨备监管指标标准^②。此外，拨备覆盖率和贷款拨备率指标要求在体现动态性调整的基础上要保持相对稳定，不随经济周期和贷款质量的变化而出现大幅度的升高或降低，从而能够更好地发挥“稳定器”作用。

综上所述，中国目前动态拨备制度简单明了，易于理解，而且具有很强的操作性。通过贷款拨备率以及拨备覆盖率指标的搭配使用和相互制约，在较好体现拨备计提动态性的同时又保证了拨备计提广泛的覆盖面。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重要工具与实践应用，中国动态拨备制度设定与宏观审慎监管要求高度契合。首先，当前动态拨备制度从银行监管角度出发，是银行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提出的一种强制性监管要求，体现了监管部门的重要决策；其次，从拨备数量上来看，按照当前拨备制度监管要求计提的数量远在按会计准则提取之上。因此，商业银行的风险抵御能力大大提高，更加符合宏观审慎监管理念要求；最后，当前的动态拨备制度根据监管指标要求，贷款拨备率的计算不再依据贷款质量而是依据全部的信贷规模，从而避免了不良贷款的周期性变化对动态拨备的影响，在一定的程度上体现了逆周期特征。

^① 贷款拨备率=贷款损失准备/贷款余额

^② 商业银行的业务特点、贷款质量、信用风险管理、贷款分类的分离程度、呆账核销均是判断微观商业银行主体信用风险大小的主要因素。

（三）中国动态拨备模式与国际动态模式的比较分析

动态拨备的实施或是以规则为导向,或是依据监管机构的相机抉择,或是将两者相结合。一些走在动态拨备制度实践前沿的代表性国家如西班牙、乌拉圭、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动态拨备在提取机制上均以客观指标为依据,用明确的规则作为判定的基础,但在计提所依据的变量及动态拨备和专项拨备的转化机制上却各有不同。一方面,西班牙、乌拉圭的动态拨备计提依据贷款作为计算动态拨备的变量,而秘鲁以GDP增长量作为变量。以贷款作为变量可以将动态拨备计提与商业银行紧密联系,而以GDP作为变量,则使动态拨备计提与整个经济运行状况密切相连。尽管GDP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但对于银行来说,其风险程度与自身的信用活动高度相关,也更能体现出不同银行之间的差异性。而且,总体来说,贷款增长要比GDP增长更为剧烈,如果将GDP作为变量,则不能直观反映贷款增长的波动程度,所计提的拨备也无法有效抵御贷款风险的变化;另一方面,西班牙、乌拉圭等国的动态拨备模型所计提的动态拨备对专项拨备的计提和补偿是自动完成的,动态拨备和专项拨备两者之和相对于贷款余额来说,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大体持平,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对贷款损失的估计是依据跨周期的历史经验数据,而非根据当前的风险确认,因此贷款损失拨备计提相对稳定。而秘鲁、玻利维亚等国家对于动态拨备的计提和补充机制非“全自动”,需要依据监管者判断或者相关的指标来确定,而且贷款损失准备总额不具有相对稳定性。

中国动态拨备制度的建立充分吸收了国外实践经验,但也存在一些结合中国经济特点的设置,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动态拨备制度实施机制不同。中国的动态拨备制度的实施采取的是相机抉择模式,而非基于规则。主要是因为以规则为导向对数据积累以及事前周期校准的要求较高,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状况,但以规则为导向是中国动态拨备制度未来建设的目标。另外,在计算拨备所依据的变量选择上,以GDP变动情况计提动态拨备并不适用于中国,中国商业银行结构层次较多,中小银行在中国的银行体系中所占比重较大,依据GDP指标对规模较小的银行较为不利。基于此,中国更适合采用信贷规模作为计算指标,以体现差异化监管。总体上看,中国动态拨备制度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同时,对国家监管机构以及监管人员对经济周期的整体把握和判断能力要求较高;二是动态拨备制度监控指标不同。实施动态拨备制度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可以平滑信贷增长,但从上述国际经验来看,秘鲁动态拨备制度的积累和释放与GDP挂钩,并没有体现出抑制信贷增长的作用。另外,与西班牙要求商业银行对新增贷款在0%—2.5%范围内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相比,中国的要求则为固定的2.5%,从抑制信贷增长这一作用来看,中国的动态拨备制度更加合理,也更符合审慎监管的要求;三是对商业银行实行差异化管理。中国动态拨备制度关注存量问题,这一点与秘鲁相似。存量法有利于监管者更为准确地计量准备金总量,从而确定单家银行的准备金计提,并且可以了解到银行业总体的准备金计提情况。由于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时间较短,因此跨经济周期测定贷款损失率的难度高、成本大。对此,中国监管部门考虑到各商业银行起点不一,结合银行自身的情况安排了过渡期,采用计算动态准备的余额模式。

（四）中国动态拨备制度监管指标分析

宏观层面上,根据银监会披露数据,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从2011年开始呈上升趋势,尤其自2014年开始上升趋势明显,到2016年第三季度已达到1.76%。从2011年实施动态拨备制度后,中国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在2012年达到最大值,2013年以后呈下降趋势,到2016年第三季度已逼近监管红线(175%),总体上与不良贷款率呈现反向变化。贷款拨备率在2011年底还未达到2.5%的监管标准,从2012年开始达标,这是因为2012年第一季度中国增提了贷款损失准备,贷款拨备余额增幅明显,且直到2016年第三季度一直呈现稳健上升趋势,到2016年第三季度,贷款拨备率为3.09%,总体上与不良贷款率呈现同向变化趋势。所以,从整个宏观层面来讲,2011年动态拨备制度实施以后,中国商业银行各项贷款相关指标均达到了监管标准。

微观层面上,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中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考察了2014年第一季度至2016年第三季度的拨备覆盖率、贷款拨备率和不良贷款率三项指标数据。结果显示,样本期内这16家上市银行的拨备覆盖率指标呈现下降趋势,截至2016年第三季度,除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外的其他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指标均逼近150%监管红线。同时,影响拨备覆盖率水平的不良贷款率在逐年上升。具体来看,2016年第三季度南京银行的拨备覆盖率最高,高达459.75%,宁波银行和北京银行紧随其后,反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均在150%的监管标准之下,交通银行、中国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均接近于监管指标;在贷款拨备率方面,农业银行4.13%居于首位,南京银行4.01%、兴业银行3.84%、招商银行3.48%紧随其后,浦发银行、宁波银行、北京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平安银行也都达到了2.5%的监管标准,反观除农行外的四大国有银行以及光大银行和民生银行均在监管标准以下。所以从微观层面来讲,只有少数银行未达到监管标准,但随着近两年不良贷款率的升高,商业银行的达标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二、中国动态拨备制度实施效果的实证检验

动态拨备制度实施的目标就是缓解原有贷款损失拨备制度的顺周期性,从而平滑和维持经济周期稳定。本文将实证检验中国动态拨备制度实施是否在总体上符合其设计初衷。除此以外,在动态拨备制度监管下,监管部门为了维持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不仅设置了贷款拨备率和拨备覆盖率等与贷款质量相关的监管指标,同时也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出了具体监管要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和《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需要在资本中扣除贷款损失拨备缺口,超额的贷款损失拨备可以相应地计入附属资本中。监管部门设定监管指标的目的在于保障商业银行更加稳健地经营,但商业银行在拨备监管及资本监管的双重压力下,可能利用贷款损失拨备计提来满足资本监管要求。比如,商业银行管理者可能在收益上升时期故意高估贷款损失以增加拨备的计提,使得财务报告中的利润降低;而在收益下降时期低估贷款损失,从而减少拨备计提以弥补财务报告中利润的大幅下降。如此“资本操纵”行为不仅违背了监管部门设置监管指标进行有效监管的目的,也会增强贷款损失拨备的顺周期性。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将在实证中检验商业银行是否存在利用拨备进行资本管理和利润平滑的行为,从另一个角度考察动态拨备制度的实施效果。

(一) 变量构成和模型设定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构建动态拨备制度实施效果评价模型。本文以拨备余额与总资产滞后一期的比率 $LLPA_t$ 衡量商业银行的贷款损失拨备;选择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ΔGDP_t 来考察动态拨备制度与经济周期关系;以贷款余额与总资产滞后一期的比率 LA_t 反映动态拨备与信贷周期的关系;以资本充足率 CRP 作为评价动态拨备制度是否存在资本管理行为的代理变量;以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滞后一期 RA_t 作为检验现有动态拨备制度是否进行利润平滑行为的代理变量;以贷款损失拨备率的滞后一期 $LLPA_{t-1}$ 作为考察商业银行上一期贷款损失拨备对下一期拨备计提行为的影响;以虚拟变量 $Regulation$ 衡量是否当期已经建立了动态拨备制度,用于考察监管部门的监管行为对贷款损失拨备计提的影响。本文选取了16家A股上市商业银行,数据区间为2005—2015年^①。银行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部分缺失数据由各家银行年报补充。GDP数据来自于Wind数据库。值得注意的是,本

^①选取的16家上市银行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平安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

文在选取代理变量时并未选取不良贷款率这一变量,因为在样本期间内,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刚经历了政府主导的不良贷款剥离。体现在数据上,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在2008年之前不良贷款率均在2%以上,尤其是农业银行2005—2008的不良贷款率严重偏离正常值,个别年份高达20%,指标严重失真。考虑到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在金融领域的重要地位及影响,因此,模型中未纳入不良贷款指标。

本文的面板回归模型如下:

$$LLPA_{it} = \alpha_0 + \alpha_1 \Delta GDP_{it} + \alpha_2 LA_{it} + \alpha_3 CRP_{it} + \alpha_4 RA_{it} + \alpha_5 LLPA_{i,t-1} + \alpha_6 Regulation_t + \mu$$

为了避免模型中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变量时,流量使用当前值,存量使用一阶滞后项;同时为避免产生异方差问题,对模型中所选取的变量使用比率值,本文参考Bouvatier和Lepetit(2008)的方法,以各家商业银行总资产作为除数对变量进行比率化处理,不能进行比率化处理的变量则使用其增长率。研究变量的定义和取值方法如表1所示:

表1 实证分析相关变量名、定义及取值方法

	变量名	定义和取值方法
因变量	$LLPA_t$	拨备余额/总资产滞后一期
解释变量	ΔGDP_t	经济增长率,实际GDP的增长率
	LA_t	贷款总额/总资产的滞后一期
	RA_t	净利润/总资产的滞后一期
	CRP	资本监管压力。此变量为虚拟变量,资本充足率大于8%取0,小于8%取1
	$LLPA_{t-1}$	贷款损失拨备率的滞后一期值
	$Regulation$	监管变量,此变量为虚拟变量,动态拨备制度实施之前的年份(2005—2011)为0,实施之后的年份(2012—2015)为1

(二) 面板模型估计方法

由于本文在模型中引入了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作为控制变量,形成了动态面板模型,导致使用最小二乘估计方法将产生有偏结果。因此,本文采用了广义矩估计法(GMM)估计模型以同时达到几个目的:第一,本文所关注的解释变量可能是内生的,GMM方法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第二,GMM模型能够帮助修正横截面数据由于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偏差;第三,GMM方法能够解决横截面估计与传统面板回归模型由于变量内生性导致的估计结果非一致性问题。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很多银行并未披露上市前数据),本文根据选取的数据截面较小,时间跨度较短,因此采用了一阶差分的一阶段GMM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在具体检验中,GMM方法估计的有效性依赖于以下假设:一是差分后的扰动项不能存在二阶序列相关。一阶差分后的差分方程可以存在一阶相关,但是不能存在二阶序列相关;二是实证所使用的工具变量有效。对此,本文利用Arellano-bond检验AR(2)的结果值来判断随机扰动项是否存在序列相关,使用Sargan检验来判断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三) 实证结果

本文首先运用Eviews9.0对面板数据的一阶差分单位根进行了检验(见表2),结果表明一阶差分数据均不存在单位根,即为平稳数据(CRP和Regulation两个虚拟变量除外)。然后,本文利

表2 各变量经一阶差分后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ADF检验	1%临界值	5%临界值	10%临界值	p值	是否平稳
$LLPA_t$	-9.456	-3.470	-2.879	-2.576	0.0205	平稳
ΔGDP_t	-8.539	-3.470	-2.879	-2.576	0.0000	平稳
LA_t	-6.783	-3.470	-2.879	-2.576	0.0019	平稳
RA_t	-6.783	-3.470	-2.879	-2.576	0.0000	平稳

用GMM方法估计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给出了显著性检验、Arellano-bond检验和Sargan检验的结果。

首先,评价中国动态拨备制度是否具有逆周期性需要关注贷款损失拨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即模型中的系数 α_1 ,如果 $\alpha_1 > 0$,说明经济处于上行阶段时贷款损失拨备也跟随增加,即贷款损失拨备具有逆周期性;如果 $\alpha_1 < 0$,则表明当经济处于上行阶段时,贷款损失拨备数量反而下降,即贷款损失拨备顺周期。

其次,评价中国动态拨备制度是否存在前瞻性需要关注贷款损失拨备与反映信贷规模的变量 LA_t 之间的相关关系,即模型中的系数 α_2 ,若 $\alpha_2 > 0$,表明在贷款高速增长时,贷款损失拨备数量增加,即符合动态拨备制度设定中对贷款拨备的要求,具有前瞻性。若 $\alpha_2 < 0$,则评价相反。

再次,评价在中国动态拨备制度下商业银行是否存在利用贷款损失拨备进行资本操纵和利润平滑行为,需要关注贷款损失拨备与 CRP 及 RA_t 的相关系数 α_3 和 α_4 ,若 $\alpha_3 < 0$, $\alpha_4 > 0$,则表明在动态拨备制度下仍存在商业银行利用贷款损失拨备进行资产管理和利润平滑行为。

最后,评价2011年以后中国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贷款损失拨备的监管行为是否有效,需要关注贷款损失拨备与虚拟变量 $Regulation$ 之间的相关系数 α_6 ,若 $\alpha_6 > 0$,则表明2011年以后中国颁布的动态拨备制度的监管规则对贷款损失拨备数量产生了正向作用,说明监管部门的监管行为有效。

表3列出了模型的估计和检验结果:
Sargan 检验的 p 值为0.203,说明通过了过度识别检验,即工具变量使用合理;此外,AR(2)检验结果说明残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

通过实证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贷款损失拨备率与经济增长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中国目前的动态拨备制度还不具备逆周期特征;贷款损失拨备率与信贷规模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中国动态拨备制度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贷款损失拨备率与利润率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与资本监管虚拟变量 CRP 呈现负相关关系,说明目前的动态拨备制度下存在商业银行利用贷款损失拨备进行资本管理和利润平滑等问题;贷款损失拨备率与监管虚拟变量 $Regulation$ 呈现正相关关系,说明2011年以后中国对拨备新监管标准的实施对贷款损失拨备产生了一定的正向效果;贷款损失拨备率与前期呈现反向变动趋势,说明商业银行上一期贷款损失拨备对下一期拨备计提行为产生负向冲击。

表3 GMM方法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p 值
ΔGDP_t	0.014***	0.0000
LA_t	0.073***	0.0000
RA_t	0.049**	0.0136
CRP	-0.280***	0.0000
$LLPA_{t-1}$	-1.026***	0.0000
$Regulation$	0.084***	0.0000
AR(2)检验	0.768	
Sargan 检验	0.203	

注:(1) Sargan 检验的值为 p 值;(2) *、**、***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

三、完善中国动态拨备制度的政策建议

中国动态拨备制度建立过程中借鉴了国际成功经验,同时针对金融行业及监管领域特点,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但不可否认当前中国动态拨备制度体系仍处于不断探索及完善阶段。从本文对现有数据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动态拨备制度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还没有达到逆周期的目标,商业银行还存在利用贷款损失拨备进行监管套利的行为。对此,本文提出了以下完善中国动态拨备制度的对策建议:

1. 加大商业银行表外非标资产的监管力度。与以往拨备制度相比,动态拨备制度的双指标监管对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当商业银行贷款拨备率和拨备覆盖率仅一个指标达标或

两个指标均不达标时,商业银行可能采取以下两种方式力图符合动态监管标准:一是增提拨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大幅度增提拨备可以使商业银行双监管指标同时达标。此方式不仅增强了银行的风险抵御能力,同时也符合监管部门设计动态拨备两个指标配合使用的初衷;二是压缩信贷规模,此方式会降低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意愿,从而冲击实体经济发展。同时,商业银行在经营利润压力下会通过“影子银行”等业务变相增加信贷投放,使得商业银行业务脱离监管。近年来,中国“影子银行”规模迅速扩张,商业银行将信贷类业务借助通道业务转换为非标资产,并通过银行理财、同业等形式运作。由于不受贷款投向约束,这些非标的资产大量投向信贷受限领域,面临着极大的违约风险,加大了银行系统性风险。动态拨备制度中并没有将非标资产纳入到计提范围内,存在着贷款损失拨备不能有效覆盖未来损失的可能性。因此,要加大银行表外非标资产的监管力度,进一步完善非信贷领域的拨备计提制度。

2. 协调不同监管指标的目标冲突。中国银行监管机构为了维持商业银行的稳健运营,根据《巴塞尔协议Ⅲ》的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要求提出了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和贷款损失准备等多项监管指标,这些指标的单独使用均具有相应监管作用,然而在同时实施过程中却存在着一定冲突。根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在动态拨备制度压力下仍然存在资本操纵问题,即银行监管部门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管会导致贷款损失拨备的顺周期性,这不符合建立动态拨备制度和进行资本监管的目标。所以,监管部门应综合分析各项指标同时使用的叠加效应,修正各项监管指标相互冲突的问题,保障各项监管指标实施的协调性,以提高监管效率和效果。

3. 完善动态拨备信息披露体系。本文实证结果所揭示的商业银行“利润平滑”行为会影响投资者对银行经营状况的判断,需要通过强化动态拨备信息披露体系建设加以克服。从西班牙的动态拨备实践可以看出,西班牙要求商业银行充分披露与动态拨备计提相关的信息,从而巩固了动态拨备制度实施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中国应借鉴西班牙成功经验,完善动态拨备信息披露体系,以提高银行财务报表透明度,使得投资者能够更加准确地判断银行经营业绩,同时也可以限制银行利用动态拨备计提进行利润操纵,降低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另一方面,监管机构还应加强对银行计提准备金水平的考察,并积极与历史计提平均水平进行对比,以帮助数据使用者合理评估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更好掌握银行在剔除风险因素后的收益水平,同时也有助于银行建立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

4. 建立与充实贷款损失数据库。西班牙动态拨备制度运行成功的保障条件之一是跨经济周期的历史数据积累。利用历史数据可以准确估计风险参数,并设定合理的拨备计提模型。而中国在数据积累和研究方面起步较晚,历史数据积累严重不足,还缺少标准的拨备计提模型,因此会出现本文研究结果中动态拨备制度没有充分实现逆周期的现象。对此,有关部门必须深入研究与贷款损失拨备相关的金融数据,尤其是跨周期经济数据,为中国动态拨备计提模型的建设提供数据支撑。而历史数据的积累可以从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两个角度同时进行:对银行监管部门而言,应完善不良贷款回收、风险分类和贷款损失统计等多项数据积累工作;对商业银行而言,应做好贷款历史数据积累和分析工作,以便未来能够获得准确判断各类贷款跨周期潜在损失的有效数据,从而计提更加合理的贷款损失拨备。

5. 完善监管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中国动态拨备制度的动态性体现在根据经济周期进行动态调整及根据商业银行进行差异化监管,本质上仍属于“相机监管”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准确判断经济周期是重点环节。然而,《管理办法》虽然说明了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必要性,但还缺乏及时准确判断经济周期的明确规则和系统性判断方法,也没有建立针对不同经济周期监管标准进行合理动态调整的机制(段丙蕾和陈冠霖,2016)。如前文所述,在经济“新常态”下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达标准度增大,迫切需要监管部门在新经济形势充分论证监管指标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并提出合理判断经济周期变化的模型,以完善监管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从而更好地体现动态拨备制度的动态性和前瞻性。当前中国拨备覆盖率150%的达标线已处于世界较高水平,而100%的拨备覆盖率水平已经能够对预期损

失进行全覆盖。在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速放缓、经济下行的宏观大背景下,适当下调拨备覆盖率有利于商业银行提高信贷发放规模和利润空间,从而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另外,在“差别监管”方面,监管机构应更加注重根据商业银行实际情况考察各家银行内部模型的科学性和稳健性。对此应充分了解各家商业银行的历史数据和贷款结构等因素,从而对不同特征、不同规模和不同贷款结构的商业银行进行差别监管,进一步体现中国动态拨备制度的动态性特征。

参考文献:

- 段丙蕾、陈冠霖:《新常态下我国商业银行动态拨备制度分析》,《新金融》2016年第6期。
- 黄锐、蒋海、黄剑:《动态拨备、金融风险与经济周期——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现代财经》2014年第2期。
- 李怀珍:《银行业动态拨备制度研究》,《金融监管研究》2012年第2期。
- 徐明东、肖宏:《动态拨备规则的西班牙经验及其在中国实施的可行性分析》,《财经研究》2010年第10期。
- 银监会财会部动态拨备课题组、李怀珍、胡永康、司振强:《动态拨备在中国银行业的实施研究》,《中国金融家》2010年第8期。
- Balla, E. & A. McKenna, 2009, “Dynamic Provisioning: A Countercyclical Tool for Loan Loss Reserves”, *Economic Quarterly*, vol. 95, pp. 383—418.
- Bouvatier, V. & L. Lepetit, 2008, “Banks’ Procyclical Behavior: Does Provisioning Matt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Money*, vol. 18, pp. 513—526.
- Fernández, S. & A. García-Herrero, 2009, “The Spanish Approach: Dynamic Provisioning and Other Tools”, *BBVA Bank, 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10.2139/ssrn.1461363.
- Jiménez, G. & J. Saurina, 2006, “Credit Cycles, Credit Risk, and Prudential Regu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entral Banking*, vol. 2, pp. 65—98.

(责任编辑:杨嵘均)

Eval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China’s Dynamic Provisioning

LIU Miao, XU Zhen-hui

Abstr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in financial supervision reform, China officially started to implement dynamic provisioning in 2011. However, since it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a relatively short period of time, the system needs to be improved on the basis of sufficient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and in particular, the effe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needs to be evaluated. This paper tries to describe the overall framework and basic set-up of China’s dynamic provisioning system. Based on a clear description of the concept and objectives of dynamic provisioning, the analyses of the indicator data and empirical data are applied to investigate the overall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dynamic provision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the Chinese banking industry and the commercial banks selected for observation have met the basic regulatory standards of dynamic provisioning, but the implementation of dynamic provisioning does not show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untercyclicality. Furthermore, some commercial banks also take the advantage of dynamic provisioning to manipulate capital and smooth profits.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dynamic provisioning system by drawing on the successful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Key words: dynamic provisioning system; effect evaluation; countercyclicality; capital manipulation; profit smoothing